

发现“风景的发现”

——读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

发布日期：2007-11-28 作者：袁博

【打印文章】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开头处引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话说，崇高不在对象之中而存在于超越感性有限性的理智之无限性中。“对于自然之美，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根据，对于崇高则要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性带进了自然之表象中的”。[1]他引用这一段话，目的在于揭示，所谓的“日本现代文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其建构过程是一个“风景的发现”的过程。而柄谷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便是要探询所谓“风景”是如何被发现的。这是一个关于学科起源的合法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将一个客体纳入某种研究范式的问题。户晓辉的《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一书有类似于柄谷的思路，作者的努力也是希望梳理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产生的历史，希望发现这个学科作为“风景”是如何被发现的过。程。在本书第一章开篇他引用的这段话可视为其对全书思想的一个总述：“科学的研究领域不以‘事物’的‘实际’联系为依据，而是以‘问题’的‘思想’联系为依据：凡在以新方法探索新问题并且一种揭示意义重大的新观点的真理借此而被发现的地方，一门新的‘科学’就形成了。”（第1页）

户晓辉在这本书中所要讲述的正是关于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如何出现、确立，如何在中国生根却携带着自身特点的命题，而对于这个学科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又是怎样在学科出现之初就埋下了“隐患”他也进行了一些初探。这一系列的讨论基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是所谓现代国家的确立过程，所借重的主要方法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全书从现象学还原与民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呈现入手，分别论述了欧美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与现代性问题，时间、现代性与“民”的语境分析，现代性话语中的“民”的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最后落脚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中的“民”，并以民间文学的方法论与精神分析的比较这一具体而微的“比较”研究作为结束。

熟悉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的人，或者即使只是翻阅过几本民俗学概论性质的书籍的人都不难发现，在民俗学这个学科讨论中有一个特殊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任何一本这样性质的书几乎无一不要从界定“何为民”这一问题入手。围绕“民”的多种定义和宽窄不同的范畴，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民俗学学科本身所携带的那种明晰的意识形态性，也不难发现这个学科内部概念的含混与难于统一。作者正是从这个难于辨明的“民”出发，进行对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这一风景的发现过程的挖掘。

讨论现代性和民间文学，我们不难将这一命题划分为几个具体问题，即何谓“现代性”；何谓“民间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自然连带着“何谓‘民’”的讨论）；现代性是如何与民间文学（民俗学）产生关联的。作者的内在理路也便基本如此。不过在他的书中，有时候“现代性”是作为“民”“民间”“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语境出现；而另一些时候，后者则成为说明前者的最有力的工具。其实二者的关系本来就不像是黑与白那样清晰划分的，事实上，现代性正是以对他者的界定来完成自身的建构的。

一、本书的关键词

首先我们可以从作者分章的标题中看出支持他论述的基本逻辑思路，即着眼于几个关键词展开分析。这些关键词分别是“民间文学”、“现代性”（在第二章这一概念同时涉及对“时间”的强调，而在最后一章则体现为将民间文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及方法论进行比较）、“民”、“问题”和“话语”（我个人将出现在题目中的“语境”“国家意识形态”也“强行”归入这一语词涵盖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问题意识产生于对“问题”的敏感。也就是他在本书开篇时候说的：“在不少人看来，把‘民间文学’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即使不算不伦不类，也有赶时髦的嫌疑。”（第1页）而他本人对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判断是在经历了一段具体的长期的田野作业之后得出的：“如今，当我面对眼前这些‘民众’的时候，我同样感到我和他们之间有一种无形却难以逾越的距离，这种距离既然不是空间的，那可能就与时间有关；既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那就一定有精神的层面。”（第3—4页）怀疑是发现

